

【我读我思】

作家首先应是一个公民

□刘天放(大学教师)

喜欢“平民作家”梁晓声，喜欢他的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浮城》，喜欢他探讨人生，还喜欢他分析现实。梁晓声过去写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我是读过的。他的“庞大无比的平民阶层‘消化’掉了它所吸纳的知识分子，使他们最终成为曾经知识化的平民，甚至‘贫民’”这一分析，从很大程度上证明了“知识分子作为阶层在中国从古至今没有真正形成过”，也是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阶层演化路径不同的结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悲悯、对普适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解读、对平民和贫民状况的分析、对农民和农民工的生存忧虑、对中国“灰社会”的补充、对人文教育和知识分子的思考，都体现着一个

作家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有人说梁晓声的新书《中国生存启示录》告别了批判式言辞，开始呈现更和谐、更幸福的“心灵鸡汤”式的励志姿态。这一观点我不大赞同，因为在有人看来所谓更加“温情”的言语里，却仍然透着他的“郁闷”甚至“愤怒”。他的新书内容是务实、客观、认真、倾力的，是当下许多人感到很痛却不言“痛”的真实描述，可谓字字铿锵。那谎言贫困、落后、苦难和不幸，却热衷于宣传和炒作时尚的生活方式便是幸福生活，被他痛斥。他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语言朴实，看似平白，背后的寓意却振聋发聩。

如今似乎“公知”多了，而经过精心的调查、实践，再把文

字写出来的人似乎少了。真正踏踏实实干正事儿、不半推半就的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文人属凤毛麟角。尤其是作家，还缺少前苏联时期一些有骨气的作家那样的胆识和勇气。当下，不少人物质上富足了，精神境界和思想修养却变得渺小了，太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忽略了思想境界的磨练和提升，导致个人私欲的膨胀、斯文扫地及责任感的缺失，知识分子情怀已荡然无存，成天干着争斗、内讧、低效等功等丑事的还大有人在。文化和知识界中少有关注国家的走向、民生的疾苦、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真正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作家都去充当前苏联作家，都去扮演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来一个山寨版的

“中国的良心”，那也未必现实，但至少我们的作家该像索尔仁尼琴那样，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一直钦佩梁晓声作为一位作家对时代的思考、愤怒、包容、劝诫，这是他站在一定高度、深入实际后的结果。他至少在做着正事儿，在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非但如此，梁晓声还在不断为他的思考注入新的内容。如他日前就痛斥一种社会现象，即当下社会对于“平凡”的否认，大量属于“屌丝”阶层的“寒门子弟”愈加自轻自贱，认为命不如人。若长此以往，未来将要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很难摆脱“宿命论”的纠缠。

是的，作家首先就应是一个公民，我就是喜欢梁晓声这一点。

【书缘悠悠】

难忘《苦菜花》

□杨延斌(个体工商户)

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文革”就开始了。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公社搞的那些批判“牛鬼蛇神”的展览，画面上画着一本本一摞摞的书，书旁画着一个个獠牙怪兽。解说员用教鞭指着画面上的书说，那些吃人的怪兽就是从这些书里钻出来的。我似懂非懂，真有点相信那些被骂作“大毒草”的书就是洪水猛兽。

十二岁时，我随姐姐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由于那里集结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知情，对书的批判就更严重了。那时，我还没见过被批判的书，只知道那些写书的人都是“阶级敌人”，那一本本厚厚的书都是“大毒草”。那年月，谁要是看那些“大毒草”，就会被揪出来绑着游街示众，还要遭受辱骂和拳打脚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营部去看热闹，在路过垃圾堆时，发现里面有一本用白纸包着的书。拿到手一翻，见书的纸张已变黄色。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被批判的“大毒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左右环顾后见没人发现，就偷偷摸摸地把书揣进怀里。跑回家，好不容易熬到晚上钻进被窝，我像做贼似地翻开书的扉页。是《苦菜花》。那时候，即使是在家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看这类书。家的东边有一片高粱地。我

一连好多天偷偷钻进高粱地里去看《苦菜花》。从此，我知道了“大毒草”中讲的都是些感人的故事。在寂静的高粱地里，我感觉那个叫冯德英的人在面对面给我讲故事。看完《苦菜花》后，我萌生一个想法：我将来也要讲故事，也要把故事写成书。

一本《苦菜花》，在我心里种下一粒种子。从此以后，我就特别留意在批判会上批判了什么书，被批到的书都成了日后我想尽办法要看到的书。渐渐地，我也可以公开地看那些被批为“封资修”的书了。看“大毒草”是为了更好更深刻地批判，这就是既能看到书又不被批斗的最好说辞。俗话说孩子病一次长一次心眼儿，我是第一次批判看一次批斗就积累一点保护自己的本事。

后来，在知青堆里传开了各种各样的手抄本。那些手抄本中的故事，好像刚从泥土中钻出来，满是沁入心底的芳香。记得最深刻的是《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当时能感动人落泪的故事，如今看来也是一般般。但就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却要以手抄本的方式走地下通道。我很敬佩那些抄书的人，他们对书的渴求和求知的激情，给予我莫大的鼓舞。

【滚滚红尘】

爱情故事的结局

□许月宁(中学生)

第一次读杜拉斯的《情人》是在我十五岁时，与故事中的女孩一样的年龄。她站在渡船的甲板上，男式帽子，樱桃色口红，旧丝绸裙子，还有黑色高跟鞋，怪异却依然美丽。她向远方眺望，湄公河在热带的阳光下闪烁。

而我在图书馆里，毫不起眼的形象，窗外的风沙正撕扯着垂柳的长发。那天，我遇到杜拉斯；那天，杜拉斯遇到那个被她讲述一生的男人，从青春年少讲到垂暮之年。他的形象不停地变化，有时丑陋，有时优雅，唯一不变的是他对她的一往情深。她对他的感情却在变，毫不在乎的玩弄与难以割舍的怀念，爱与不爱大概只在她的笔尖抖动之间。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若先生爱上了并不美丽的苏珊，而苏珊爱的只是他给予她的礼物，从指甲油到钻戒。他爱上她，便失

去了反抗的权利。若先生的绝望，不过来自心存幻想。尽管如此，我想杜拉斯还是爱那个中国男人的，有些语言必然要以爱为出口才能倾泻。或许她太年轻，无法直面那段错失的异国恋情。湄公河在永不止息的奔流中成长，她成了作家，经历过数场恋爱，看过一位位情人，而她提笔写下《情人》时，故事勾勒出的依然是那个男人并不高大的身影。因为太年轻，所以有些记忆将陪伴终生，像美丽的刺青，磨灭不了的记号。

故事的结尾，女孩在巴黎接到他的电话，他已组建了新的家庭，但他说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她，电话两端只有双方的啜泣。后来，他们不再相忆，不再联系，只有回忆中共同的湄公河奔流如昔。

无论爱与不爱，只将回忆铭记，谁说这不是爱情故事最后的结局？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王昱



中国人的“劣根性”咋来的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人性曾经有这样一段见解独到的描述，他说那种认为人性一成不变的见解其实是一种谬误，“人的性格其实就像一条河一样，不断被周围环境所塑造，当它流过狭窄的地方时湍急，当它流过宽阔的地方则舒缓”。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山寨”了一把这个比喻，只不过在他的比喻中，那个本体变成了全体中国国民的国民性。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时下反思中国人“劣根性”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更有从成年大哥到北大教授的一干人等，喜欢借此为种种奇谈怪论“洗地”。在这片喧嚣中，本书独辟蹊径，它告诉你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的祖先也曾单纯而淳朴、勇敢而自尊、独立而热爱自由。那么又是什么让中国的国民性如瀑布般飞流直下呢？本书为你解答了所谓“劣根性”真正的治病机理。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张宏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听法理学家讲故事

众所周知，法律这东西很枯燥，哲学这东西很难懂，然而这个世界上偏偏有一种这俩东西的结合体，名曰法理学。该学问汇集了两者的枯燥与难懂，所以一般的法理学书籍都带有“折腾死人不偿命”的气质，读者若不是为了谋生或考试，奉劝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法理”。

不过，今天要介绍的这本《洞穴奇案》却是奇书一本。该书是个正经法理学家写的正经法理学书籍，但该书出人意料有趣，原因是书中很不正经地虚构了一个恐怖故事：五个探险者受困在山洞里水粮皆绝，为了生存，他们最终抽签吃掉了一个同伴。而后他们被解救出来，以谋杀罪被告上了法庭。那么他们有罪吗？本书中，你会看到作者借不同的人物之口，以不同的法理学观点对该问题做了解读。当你把这个故事听完时，也就同时完成了一次对20世纪西方法理学的走马观花——不过，即使这些理念你一个都没记住也没啥关系，你一定能从这场“大脑体操”里学到点别的东西。比如，对我而言，本书最有价值的问题就在法理学之外——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少部分人的利益是可被牺牲的吗？这个问题其实拷问了整个人类史。

《洞穴奇案》
彼得·萨伯 著
商务印书馆

(作者为本报国际新闻部编辑)

【读书信息】

国际儿童图书节，全世界儿童的节日

□赵世峰

全世界儿童的节日，除了“六一”国际儿童节，还有4月2日的国际儿童图书节。可是在我们国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节日。

4月2日是安徒生的诞辰纪念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儿童图书节，从1967年起，邀请世界各国每年都庆祝这个节日。各个国家轮流主办庆祝活动，主办国选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为世界各国的孩子写一篇献词，选出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插画家绘制一幅海报。献词翻译成英、法、德、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语言，与海报一起分发向各个国家。今年图书节的主办国是爱尔兰，主题是“读故事，想象那些国家”。

每两年一届的世界儿童文学最高奖——安徒生文学奖，也在这期间举行的意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公布，获奖作家的名字迅速传遍世界。今年的获奖作家是日本作家上桥菜穗子，获奖画家是巴西画家罗杰·梅洛。

2007年4月2日，在纪念国际儿童图书节40周年的时候，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儿童读物促进会)宣布这一天同时为“中国儿童阅读日”。

国际儿童图书节与中国的结缘完全是“阴差阳错”。据最早接触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著名作家、劳伦斯小说翻译家黑马(本名毕冰宾)先生介绍，1985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他得到了一趟去澳大利亚开会的美差——参加“国际青年图书局”主办的大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后来官方的翻译是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并用英语做一场《中国的青年文学》的演讲。待到达目的地与主办方交流之后，黑马才明白所谓“国际青年图书局”(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中的“青年”(Young People)其实指的是少年儿童，甚至更偏向儿童。由此，中国开始了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的接触。1986年，我国派团赴东京参加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大会，正式加入了这个组织。

因了这次机缘巧合，黑马先生一直致力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在我国的推广工作，并翻译了历年国际儿童图书节献词和安徒生奖得主受奖演说辞结集出版。这本书以IBBY创始人叶拉·莱普曼夫人在1967年第一届国际儿童图书节发表的献词命名，就叫《长满书的大树》。

我们应当感谢“局外人”黑马先生不遗余力的推介和默默无闻的奉献，中国大陆的孩子们和家长才有机会知道国际儿童图书节，了解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截至目前，我国尚无人摘取安徒生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正如黑马先生所言，我们今年庆祝这个节日，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应该当主办国，主办某一年的国际儿童图书节，还要让每一年发布到全世界的图书节海报上有中文，由最负盛名的中国作家为这个节日书写献词，让我们古老而年轻的文明之声传达到全世界儿童的心海，真正与这个节日互动。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
qlbook@163.com